



巴瑞·莱文森



王全安



刘赫德森



贾樟柯

艺术·焦点

泛媒体时代 电影怎么拍

——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论坛观察

本报记者 成长

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于日前在上海落幕,相比较星光熠熠的红地毯与闭幕仪式,电影节主办的一系列论坛活动似乎更受业界关注。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逐步扩大,电影票房屡创新高,中国电影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日益加深,中国电影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日益涌现。围绕着中国电影的一些焦点问题和当代环境下电影艺术的创新与突破,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知名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影评人等电影界人士参与论坛,各抒己见,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其中既有关国际及中国电影市场增长点和合作之路的“产业论坛”,也有专业细致地剖析电影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电影新浪潮”,还有搭建电影大师与年轻电影人交流平台的“电影大师班”,以及由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亲自主持的“电影节论坛”。记者参与了其中三场论坛,聆听了来自电影行业前沿的观点碰撞,也感受到了从业者对电影未来发展的殷切期待。

拿着感情找类型

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的电影业,类型片都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随着电影在类型上的区分,不同类型的影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和营销方略,推动了电影市场的繁荣和多元化。然而,随着个别导演在类型片上的成功,电影界内盲目跟风和低端复制的趋势日渐突出,如何给中国电影类型的寻找和突破,一定不是拿着算盘找到的,而是拿着感情找到的,他说。

而在商业片领域有着较佳成绩的导演张一白明确表示:“类型不是一切。”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提到,在拍《开往春天的地铁》的时候,中国社会和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都市爱情片的阶段,拍这类影片实际上有些超前。而在拍摄《杜拉拉升职记》和《将爱情进行到底》时,中国的白领已经成为一种阶层,形成一种文化,拍这样的电影就有市场。他还认为,当前大片的资源只集中在个别导演身上,对影片的投资更多看重成本规模而非题材类型,这也是类型片发展中遇到的困境。

武》、《世界》等影片路数上靠。许多影评人对他说:“我又看到一个假冒伪劣的‘贾樟柯电影’。”贾樟柯认为,那些能给类型片带来发展的导演,他们在筹备影片的时候,实际不仅仅考虑该类型影片在市场上的表现,而更看重该类型片本身是否符合自己的创作需求。发现下一个类型,应该在类型中寻求突破。“我觉得类型的寻找和突破,一定不是拿着算盘找到的,而是拿着感情找到的,他说。”

而在商业片领域有着较佳成绩的导演张一白明确表示:“类型不是一切。”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提到,在拍《开往春天的地铁》的时候,中国社会和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都市爱情片的阶段,拍这类影片实际上有些超前。而在拍摄《杜拉拉升职记》和《将爱情进行到底》时,中国的白领已经成为一种阶层,形成一种文化,拍这样的电影就有市场。他还认为,当前大片的资源只集中在个别导演身上,对影片的投资更多看重成本规模而非题材类型,这也是类型片发展中遇到的困境。

导演和制片人像婚姻关系

在电影产业中,导演的角色往往对影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作者电影”到“导演中心制”,导演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瞩目,但导演在自己的角色中所面临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关心。导演如何在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同时又兼顾处理好与制片人、与投资人、与市场需求、与个人名声之间的关系?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英才孵化计划”的艺术总监,两位国际级导演刘赫德森、比利·奥古斯特及编剧格雷格·莱特通过“电影大师班”的方式与年轻的电影从业者 and 学子展开了交流。

比利·奥古斯特对于导演与

制片人的关系深有体会,认为导演与制片人的合作至关重要:“导演和制片人首先要达成共识,要有同样的愿景,如果一开始就有分歧,那这个分歧就很难消失了。我不建议导演和制片人一个人承担,在好莱坞,制片人都是先找剧本,再找演员,如果和导演有分歧,就会把他换掉。”刘赫德森则表示,导演和制片人就像是婚姻的关系,当然离婚率也是很高的。“制片人应该鼓励导演,不管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都应该是如此。制片人不能指手画脚干预太多,但是他还是应该在留给导演足够的创意空间的同时,给导演一些冷静的提醒,因为有时候导演拍戏也是盲目的。”

刘赫德森认为,导演除了具备创意,还必须具备较好的体能,从而与各方力量周旋,坚持自己的立场。比利·奥古斯特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情况:“导演还是应该有选择演员的权利,因为演员很重要,如果制片方一定要坚持选择不合适的演员,我想我也许会放弃拍摄。”在谈到导演与编剧的关系上,身为编剧的格雷格·莱特认为,编剧薪酬过低在全球是普遍现象,不独中国才有。他并不介意导演把剧本拍成不同的风格,也并不会因为想保持自己的风格而当导演:“当导演太难了,我不想当。你们说中国缺编剧,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编剧都想当导演吧?”

真正的镜头应该是导演自己的眼睛

对于电影业的发展,我们也许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拥有便捷的感知工具和媒体形式,但我们也许又处于一个最纠结的时代——因为电影越来越脱离了它诞生时的本来面貌。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拍摄电影的门槛越来越低,人人都可以当

导演,是否还应当强调曾经的精英式创作?精英式创作又应该去克服什么问题?本届电影节评委主席、美国导演巴瑞·莱文森与中国导演王全安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王全安认为,电影是技术的产物,电影表现形式随着技术变化而变化。然而电影的目的是讲故事,这从电影诞生开始就未曾改变。“我个人觉得讲故事的意义在于我们要表达一个情感,而不是技术,技术会越来越容易,但是有意思来讲的故事依然非常少。真正的镜头应该是导演自己的眼睛。”

巴瑞·莱文森对此深有体会,他提到,即便在美国,目前想拍摄反映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故事片非常难,如果影片中没有打斗,没有超级英雄,会被认为没有销路不受市场欢迎。他坚信,电影是否受欢迎并不是影片中所谓的“热门元素”决定的,他以自己在1980年代拍摄的《雨人》为例,这一题材当时并不被看好,其制作成本仅有2100万美元,却收获了5亿美元的票房。“但是现在他们只拍那种超级英雄电影、流行电影,想拍以前那样的影片很难了。”

以拍摄“文艺片”著称的王全安也谈到,中国电影始终面临片种单一的现状,以前是完全注重于宣传影片,现在又是清一色的商业片,文艺片在中国处境很困难。“以前面对是体制,现在面临是物质。现在的文艺片导演不仅要跟环境做斗争,还要跟自己做斗争,因为拍商业片能赚钱。”

对于电影受众在新的媒介形式下的冲击,巴瑞·莱文森表示,自己其实是受益者:“很多的经典电影我都是在电视上看的,这并没有减少我对电影的喜爱。”他对电影与电视的结合前景持积极的态度,认为电影创作者也应该更多考虑通过DVD等多种渠道观看电影的受众。

艺术·影评

《雪花秘扇》的片名,来自于电影女主角之一全智贤饰演的雪花,以及她与李冰冰饰演的百合所使用的传情工具——秘扇。为何叫秘扇?因为纸扇上所写的内容是如今濒临失传的女书。想理解这部电影,必须要了解一些关于女书的历史,作为一种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起源于清末清初并流行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一带的女书,不仅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人类语言活动中少见的一个创举。

女书作品常以七言诗形式出现,多书写于纸片、手帕、纸扇、布扇之上,或用于当做嫁妆礼物相送,或取代书信用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之用。为了追求一种诗意效果,《雪花秘扇》只表现了扇子这一女书载体的功用,它时常令人想起类似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千古奇情,但实际上,借助女书进行交流的“老同”(有共同兴趣爱好,可以推心置腹长久交往的女性朋友,类似于结拜姐妹),和爱情几乎没有关系,“老同”只不过是女性在自身地位低下的时代,借以以一种坚定的情感以抵御世事无常的依靠而已。

了解这些背景信息之后再去看《雪花秘扇》,就不会觉得它是一部女性版的《断背山》,李冰冰和全智贤的情感表达在片中被严格限制在伦理之内。影片的格局还是有的,以东方神秘主义吊起观众胃口,以两个女性不同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动荡和生存环境的残酷,继而衬托出人类情感中最珍贵的那一部分,即忠诚、信任、诺言,以及一种

不讲道理的自我牺牲。这些珍贵的情感在当下是缺失的,《雪花秘扇》带来的震撼也在于此,它通过对一段偏于一隅的历史的描写,对现代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各种失去温度的情感关系进行了冷峻的批判。

中国的文化一直在强调男性之间伟大的友谊,桃园三结义、梁山好汉等等数不胜数,但遍寻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也难发现女性之间令人动容的友情故事。在封建社会,“女人是祸水”通过道家之口几乎渗透到男性群体的每一个人,很多女性也不自觉接受这种说法,把出于某种政治诉求的制约和社会大环境的偏见当成自己的命运。《雪花秘扇》的故事,其实就是对这种命运的反抗,女人在男权社会通过“老同”的形式,实现了“一对一”的结盟,她们创造着只有女人才看得懂的文字,交流着只有女人才懂的情绪,这无疑是在自身制造了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

说到底,《雪花秘扇》是一部反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电影,它强调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助与脆弱,也诠释了人与人之间“1+1大于2”的群体属性。在雪花和百合看来,她们虽然人生际遇不同,彼此之间也有过误解,但因为曾经结盟,所以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她们内心都有笃定的东西,这种笃定,其实是信仰的力量造就的,这种信仰也让“老同”在“夫为妻纲”的重压下,有了顽强生存下去的坚韧,因为她们相信:即便这个世界把她抛弃了,还总会有一人站在原地,那个人的友谊,会是她永远的家园。

从《雪花秘扇》看女子情谊

韩浩月

艺术·镜头

纪录片《走近李大钊》播映

本报讯 (记者李坤)为庆祝建党90周年,经过3年筹划、拍摄,由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等多家单位联合摄制、出品的5集纪录片《走近李大钊》已摄制完成,并于6月23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李大钊故居首映。

据介绍,纪录片《走近李大钊》从李大钊的日常生活出发,深入、细致地再现了李大钊投身革命到慷慨就义的短暂一生,该片独家采访到李大钊唯一在世、

年近九旬的儿子李光华及多位李大钊第三代亲属和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权威专家表示,片中搜集了许多珍贵的视频资料,如李大钊在莫斯科的演讲,最新披露了彭真、薄一波、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李大钊的回忆和评价,对党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该片于6月24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档案的见证,光辉的历程”档案资料展”现场播映,并将于近日在“北京党建”频道播出。

纪实电影《太行骄子》在京首映

本报讯 (记者李坤)近日,真实反映全国劳模、孟电集团董事长范清荣事迹的纪实电影《太行骄子》在北京首映。这部电影是根据耿梦杰、刘金城的长篇报告文学《太行骄子范清荣》改编而成,是河南电视台、新乡市委宣传部和辉县市、市政府通力打造的一部反映节能减排力作。它取材于范清荣的真实经历,讲述了范清荣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顶住压力,忍痛炸掉一手建成壮大的“小火车”的故事。

据介绍,本片由河南省委宣

传部、河南电视台与辉县市、市政府联合拍摄,导演是曾经执导过《北极光》、《公安局长》等影视剧作的国内实力导演王冰河。总政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翟万臣出演男一号,饰演主人公范清荣;豫剧名家、国家一级演员王希玲出演女一号,饰演范清荣的爱人顾淑英。

据制片方表示,影片将于近期作为建党90周年献礼片在央视六套播出,在新乡实地拍摄的《太行骄子》将进一步助推新乡红色旅游的发展。

《太阳总在左边》展现西藏风情

本报讯 (记者成长)6月11日,25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影院(UCCA)展映了两部中国独立导演的影片:松太加执导的《太阳总在左边》、徐童执导的《老唐头》,展映之后,两位导演同观众进行了交流。

松太加导演的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是一部关于救赎的电影,是中国少有的“公路电影”,取材于真实事件:两兄弟遭遇母亲的意外死亡,该如何面对将来的生活?影片试图通过主人公特定的经历和心灵体验,探寻和追问生活迷茫和内心失落背后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识,并通过展示戈壁独特的自然美景,烘托藏地高天厚土之间撞击灵魂深处的心路历程,表达藏人坦然面对悲欢聚

合和死亡本性的处世态度。《太阳总在左边》同时也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电影”,该片主创人员全部由藏族电影人组成。该片入围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老唐头》则描写了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的老唐头的传奇一生。这是部鲜活的小人物传记,它把正在进行的生活和老唐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时间跨度近80年。它描述了中国社会里的小人物在宏大的历史变迁中既传奇又卑微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是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折射。该片入围第3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人道奖纪录片竞赛单元,获得第1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基金、第16届上海电视节MIDA导演计划“优胜提案”。

艺术·剧评

物质与爱情在婚姻中的失衡

——观电视剧《裸婚时代》

郝婧

发收视热点。近期,由网络小说《裸婚——80后的新结婚时代》改编的电视剧《裸婚时代》播出之后,再次让“80后”的“裸婚”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裸婚时代》与以往表现婚姻生活的电视剧相比,不再过多纠缠于“第三者”“信任危机”等问题,而以“裸婚”为主要表现对象,尝试直击物质现实与爱情理想相冲突的焦点话题。

剧中的男主角刘易阳是个

无房、无车、无钻戒的“三无男人”,这也正是女方家长不能接受他的原因。女主角童佳倩虽然不是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长大,可也算得上是小家碧玉。两个人从高中时代起相恋8年,从感情上讲,结婚本是水到渠成的事,却碍于没新房、没存款一直没能结婚,直到童佳倩怀孕,两人始“奉子成婚”。但遗憾的是,选择“裸婚”的他们虽然有着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并没有从此走入幸福殿堂。由于两人经济条件有限,成长环境不同,生活习惯各异,使生活中的诸多琐事成为他们多年感情的致命伤。在婆婆眼里,童佳倩买回来的鲜花不如芹菜有用;童佳倩在家做面膜把刘易阳的奶奶吓得犯了高血压;从没自己动手做过饭菜的小两口把厨房搞得一团糟;童佳倩的妈妈担心怀孕的女儿,出面干涉小两口夫妻生活,还让女婿签保证书,更是让刘易阳深感尴尬。两人之间的矛盾在平淡的生活中逐步升级,最终走向了离婚。

这部电视剧呈现给观众的,是物质现实对爱情理想的强烈冲击,尽管全剧结尾流露出有一丝温暖的情愫,重新点亮了观众的希

望,却也并没有直接表现两个人重新走到一起。

“裸婚”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几十年前较为简单单纯的婚姻不同,在当前世风浮躁、攀比盛行之时,“裸婚”带来的种种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然而,现在的人们虽然追求物质享受,却也难逃对真挚感情的向往这一事实,总是想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赢。和众多家庭伦理剧一样,《裸婚时代》在表现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同时,也为观众们保留了许多温情脉脉的场景。剧中刘易阳一次次真情告白,对童佳的挑剔一再忍让,童佳倩为刘易阳结婚而与母亲争执不已,甚至发展到绝食、偷户口本,这些为爱坚持的努力为相对灰暗的裸婚生活涂抹上了若干亮色。与此同时,这种描写也更容易引发人们关于“裸婚”问题的激烈讨论。

《裸婚时代》立足现实,注重情感刻画,足以让观众为之动容、为之思考,但剧中主人公的身份设置,对于现实中的“裸婚”群体而言,尚不够典型。刘易阳和童佳倩“裸婚”的程度有限,两人都有家可住,两个人又都是小白领,温

饱不成问题。好在作品在揭示“裸婚”的种种问题时,还是尽可能地展现了婚恋生活中甜蜜美好的一面,让现实显得不那么残酷。比如,婚后刘易阳对童佳倩还是相当宠爱与包容的,在父母、奶奶、丈母娘和媳妇之间表现出八面玲珑的一面,远远不止是“双面胶”的功效,他在自己父母和妻子面前逞强,遇到问题自己一个人咬牙撑着。任性娇宠的童佳倩在嫁到刘家后也真心地想努力扮好孝顺媳妇、贤惠妻子的角色,第一次下厨就不敢让自己的母亲知道,她得知刘易阳丢了工作以后还在尽可能地关心和,不给他增添压力。然而,相恋8年才结婚的一对夫妻,如此努力付出,也没能拦住生活琐事对感情的冲击,坚持“裸婚”的他们在婚后一年就离婚了。吃散伙饭的时候,刘易阳将婚姻失败的原因总结为“细节打败爱情”。当婚姻理想被物质生活摧毁之后,他“失有所失”,却仍然痛哭失声。

在当下的社会,这种因裸婚的失败而带来的哭声能有多大的社会代表性呢?感情与物质在婚姻生活的天平中到底占据着多大的比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雪花秘扇》剧照



《裸婚时代》剧照